

中華學術叢書

# 唐長孺文存

唐長孺 著

朱 雷 唐剛卯 選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學術叢書

唐長孺文存

唐長孺 著

朱雷 唐剛卯 選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 C I P ) 數據

唐長孺文存/唐長孺著;朱雷,唐剛卯選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12

(中華學術叢書)

ISBN 7-5325-4490-7

I. 唐... II. ①唐... ②朱... ③唐... III. ①唐長孺  
(1911~1994)—文集②史學—中國—文集 IV. K20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083542 號

中華學術叢書

## 唐長孺文存

唐長孺 著

朱雷 唐剛卯 選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mailto: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在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新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24.625 插頁 5 字數 460,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300

ISBN 7-5325-4490-7

K·890 定價: 6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 出版說明

自 1991 年王永興先生的《唐勾檢制研究》、柳存仁先生的《和風堂文集》與項楚先生的《敦煌文學叢考》出版以來，《中華學術叢書》至今已走過了十五個年頭，已刊與將出的名家研究著作，也已接近二十種，並在海內外學界贏得了高度的贊譽。當前民族文化的復興已成為國家的文化戰略，而學術昌隆，正本清源，更是文化復興的前提，為此，本社決心花大力氣，通過相應的調正，來加強本叢書的出版力度。

《中華學術叢書》定位為海內外漢學界高端論著交流的平臺，以及時薈萃一流漢學研究著作為己任。她與集成性整理性質的《中華要籍集釋叢書》並列，將成為本社古籍整理與古籍研究的兩個核心品牌。

《中華學術叢書》將不限於原初以傳統漢學研究為主的格局；凡學殖豐厚，思理深刻，卓有創見的漢學研究，無論其方法是傳統的還是新潮的，其視角是單一學科的還是跨學科的，都將進入編者的視野。

《中華學術叢書》的作者，將由原來以大陸老一輩專家為主，而擴展為朝向一切術業有專攻的學者，她既為名家人師一生著作的集粹，也可以成為中青年俊彥頭角初露的溫床；她對於大陸、港澳臺乃至各國漢學家的優秀著作一視同仁，因此部分漢譯著作，也將

適當採納。

《中華學術叢書》的形式，以專著、專史、專題論集爲主，也適當地採用“文存”的形態，如果有既合乎基本學術規範，而形式更有創新的著作，也不妨嘗試。

我們感謝已進入本叢書的各位專家的奉獻，感謝本叢書各個方面的熱誠讀者；我們更衷心地期盼與更廣大的作者群通力合作，共同打造好《中華學術叢書》這一知名品牌——爲了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

# 前 言

朱 雷

唐長孺師 1911 年出生於江蘇省吳江縣平望鎮。1932 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文科，後在多所中學任教。1940 年任上海光華大學歷史系講師，1942 年春任藍田國師史地系副教授。1944 年受聘於遷至四川樂山之國立武漢大學歷史系，任副教授，1946 年晉升為教授，此後一直執教於武漢大學。

唐師本有中國古典文學及書畫之家學傳統，而於治史則先後深受呂思勉、李劍農、陳寅恪諸史學大師學術影響。唐師早年治遼金元史，至國師後，轉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故認真研讀寅恪先生的論著，深得其精髓。1945 年，唐師撰成《唐書兵志箋證》一稿，經寅恪先生評審而被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聘為教授。

新中國建立後，唐師發表了一系列論著及學術文章。《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唐書兵志箋證》等著作的出版，以及不少學術論文的發表，對這一時期人所未發或懸而未決的許多重大問題，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不僅得出一系列極富啓迪性的權威結論，而且開闢了一大批頗具研究潛力的新課題。特別是唐師在既有繼承，又

有深化、發展的獨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上，更是嘉惠學林。

1964年，唐師主持點校北朝四史工作，歷時十載。由於深厚的學術積累，過人的學術見識，謹嚴的學風，故能充分利用前人成果，而又發前人所未發，道前人所未道。唐師所親自撰寫或審定的“校勘記”，實是校勘與研究的有機結合，而被海內外公認為“古籍整理的優秀成果和範本”。由於唐師對古籍的深厚造詣與突出成果，他被聘為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

20世紀70年代初，唐師年逾六旬，并早已名播海內外，但他出於對史學執着追求的熱忱，以其敏銳的學術眼光，在初步了解到吐魯番出土文書的學術價值後指出：對這批文書加以整理研究，“將導致唐史研究為之改觀”。他於1974年建議組織專門力量對之進行整理出版，並於1975年親赴新疆考察。在庫車古道上，因路途艱險，致使右眼失明。由於唐師之倡議，經國務院批准，由唐師主持成立了“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唐師因眼疾住院半年，剛出院就全身心投入文書整理與研究，特別是通過整理工作，培養了一批文書整理與研究的專門人才。十易寒暑，終告完成。他所主編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十冊的出版，使沉睡千年的古冢遺文經科學整理，公諸於中外學人，并創造了文書整理的一套科學規範，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評價，榮獲國家古籍整理特別獎、國家社科基金優秀成果一等獎。

1980年唐師受聘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編委及中國歷史卷副主編、隋唐五代史分卷主編。他親自組織，擬定條目，審定文稿。唐師又建立了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招收了多批碩士、博士生。為了培養本所教師，創辦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年刊）；結合出土文書的整理與研究，主編并親自撰文，出版了《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初探》（一、二編），撰著了《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山居存稿》。唐師晚年目力日趨衰竭，絕症纏身，猶自題“著書敢期延歲

月，湖山倘許小盤桓”，賦詩云“晴窗自把雕蟲筆，摸象捫盤強著書”，表達對人生的通達和學術上的執著追求。在多年潛心研究的基礎上，溯源思變，探求三至九世紀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對其長期思索本段歷史的心得作了理論性的總結，形成一系列創見，撰著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給學術界留下了一份珍貴的遺產。

唐師之學術，首先是繼承了錢(大昕)、王(鳴盛)等乾嘉學派之優秀傳統，繼又受到呂(思勉)、李(劍農)之影響。然作為“講堂著籍恨無緣”的“教外別傳”弟子，唐師深受陳寅恪先生的影響，而得其精髓。建國後，唐師是虔誠的學習了唯物論與辯證法，並與“實證”的方法結合。這在他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當時寅恪先生閱後，覆函贊云：“寅恪於時賢所論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獨誦尊作，輒為心折。”表明了寅恪先生對唐師的肯定。

唐師一生潛心治學，淡泊名利，然又時時關心民族的命運、國家的前途，早年曾冒着生命危險，偷越日寇封鎖綫，投奔抗日大後方。上世紀40年代以後，唐師雖已成史學名家，然於同輩乃至後學晚生，皆待之以禮。“自是桃李樹，何畏不成蹊”，唐師在國內外學術界獲得了極高聲譽，被公認為當代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及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研究領域的權威，不少海內外學者慕名前來交流、問學。這些學術交流活動，特別是中日兩國史學界之間的交流，對史學的進步作出了貢獻。

因唐師之學術成就，故受聘或公推而先後擔任多項學術兼職。唐師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兼職研究員、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湖北省歷史學會會長、湖北省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史學會理事等，唐師又兩度出任武大歷史系系主任，為歷史學科的建設與發展、人才培養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唐師因多年辛勤耕耘於學術之中，且年逾五旬之後，多在外地

工作，條件極差，積勞成疾，終成絕症，藥石無效，於 1994 年 10 月 14 日逝世，享年 84 歲。

唐師病逝噩耗一經傳出，國內外學術機構、院校及中外知名學者紛紛來電來函哀悼。北京大學周一良、田餘慶教授合作挽聯云：“論魏晉隋唐，義寧（按指陳寅恪先生）而後，我公當仁稱祭酒。”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宮琦市定唁電贊譽唐師，“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等方面，建樹了卓越的業績，他的治學方法及其研究成果，是留給日中兩國史學界的一筆永恒的遺產。唐長孺教授的名字與他的業績將永遠被載入 20 世紀的史冊”。唐師的摯友、日本京都大學名譽教授谷川道雄先生在唁電中稱唐師“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也是我們日本中國史同行最尊敬的師長，他的學術及其為人將永遠為我們日本學者所懷念”。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池田溫先生電傳挽聯“六朝隋唐發揮史識高昌文書開拓新域”，也是代表日本學界高度概括和贊譽了唐師一生的學術主要業績。

近承上海古籍出版社之支持，擬出版唐師論文選集，囑我等唐門弟子，選編若干，結集出版。而唐師之學術，實是文史通淹。厥其大類，則包括多方，既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遼金元史，又有敦煌吐魯番文書。而所研究之問題，則又有政治、經濟、軍事等制度，並及民族、階級與階層、經學與玄學、佛教與道教。茲謹選出我們認為較有代表性的 42 篇（其中 13 篇係未刊稿），以饗大家。

“雖歲華不與，湖山吝情”，但唐師的學術成就、良師風範，將同他為之畢生奮鬥的學術事業永世長存。

# 目 錄

|                          |       |
|--------------------------|-------|
| 前言.....                  | 朱 雷 1 |
| 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           | 1     |
| 清談與清議 .....              | 26    |
| 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 .....    | 35    |
| 《晉書·趙至傳》中所見的曹魏士家制度 ..... | 59    |
| 魏晉戶調制及其演變 .....          | 66    |
| 九品中正制度試釋 .....           | 92    |
| 士族的形成和升降.....            | 133   |
| 魏晉才性論的政治意義.....          | 144   |
| 魏晉玄學之形成及其發展.....         | 157   |
| 西晉戶調式的意義.....            | 194   |
| 范長生與巴氏據蜀的關係.....         | 210   |
| 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         | 219   |
| 魏晉南朝的君父先後論.....          | 232   |
| 魏晉期間北方天師道的傳播.....        | 248   |
| 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佔領.....      | 262   |

|                      |     |
|----------------------|-----|
| 南朝寒人的興起·····         | 287 |
| 論南朝文學的北傳·····        | 319 |
| 拓跋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    | 349 |
| 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 | 400 |
| 魏周府兵制度辨疑·····        | 429 |
|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客和部曲·····    | 464 |
| 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 | 486 |
| 南北朝後期科舉制度的萌芽·····    | 512 |
| 唐代的客戶·····           | 520 |
| 唐代色役管見·····          | 555 |
| 唐代宦官籍貫與南口進獻·····     | 584 |
| 唐修憲穆敬文四朝實錄與牛李黨爭····· | 593 |
| 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的西州府兵·····   | 642 |
|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綜論·····   | 702 |
| 《文心雕龍》“士衡多楚”釋·····   | 718 |
| 太平道與天師道——札記十一篇·····  | 733 |
| 一 曹騰宗族墓磚文與黃巾口號·····  | 733 |
| 二 襄楷與《太平經》·····      | 735 |
| 三 張普題字碑與天師道初傳·····   | 739 |
| 四 天師道組織和思想·····      | 741 |
| 五 所謂“脩法略與角同”·····    | 745 |
| 六 黃巾起義之後的太平道·····    | 747 |
| 七 三國晉南北朝蜀地天師道·····   | 752 |
| 八 晉代葛、許兩家僊道之異同·····  | 753 |

目 錄

|                      |         |
|----------------------|---------|
| 九 天師道之服黃 .....       | 759     |
| 十 東晉士族與天師道杜孫教團 ..... | 760     |
| 十一 孫恩起兵的直接原因 .....   | 763     |
| 葛榮未任懷朔鎮將辨.....       | 767     |
| 後記 .....             | 唐剛卯 773 |

# 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

## 一 東漢後期的大姓和地方政權

東漢時期大小封建地方勢力具有發育滋長的傾向，這種封建勢力是在宗族、鄉里基礎上培育成長起來的，因而具有古老的農村結構根源。

史籍上我們經常見到大姓、著姓、冠族、甲族，與之相對稱的是所謂“單家”。大約在東漢時南北各郡正在逐漸形成較固定的、普遍承認的地方當權大姓，比如天水有姜、閭、任、趙<sup>①</sup>，馮翊有桓、田、吉、郭<sup>②</sup>，廣陵有雷、蔣、谷、魯<sup>③</sup>，吳郡有顧、陸、朱、張，會稽有虞、魏、孔、賀，更為世所習知。《華陽國志》記巴、蜀、漢中、南中諸郡所屬縣大姓甚詳。

各級地方行政機構通常是由地方大姓中代表人物組成的。漢代的刺史、太守、縣令是由朝廷任命的，而他們的僚屬卻必須由當地人充當。大姓子弟享有優先任用的權利，《三國志》卷八《公孫瓚傳》注引《英雄記》：

---

① 《三國志》卷一三《王朗傳》注引《魏略·薛夏傳》。

② 《三國志》卷二三《裴潛傳》注引《魏略·嚴幹李義傳》。

③ 《晉書》卷四六《劉頌傳》。

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爲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

公孫瓚的話說明東漢後期州郡進用“衣冠子弟”是通例，他們獲得職位也認爲理所當然，不會感謝進用他的長官。由於州郡僚佐所謂“大吏”、“右職”例由大姓充當，單家要擠入這個行列就很困難。《三國志》卷二三《裴潛傳》注引《魏略·嚴幹李義傳》：

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爲右職。

嚴、李二人是單家，爲了突破冠族的壟斷，他們在分郡時一起在東部落籍。果然，在無冠族的東部他們都當上本郡右職，他們成功地投上了這個分郡之機。

既然州郡大吏照例由大姓、冠族充當，而大姓冠族每郡祇此數姓，因而州郡大吏就帶有世襲性。《後漢書》卷六六《王允傳》：“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王允祖先名位不見本傳，祇是世代充當州郡僚佐，也就成爲冠族。我們翻檢《後漢書》、《三國志》諸傳，累世出身州郡僚佐的頗有其人，雖然升遷官位不止於此，論出身也可說“家世仕郡”。蜀、吳政權創立者劉備、孫堅雖然門第不太高，但劉備的父祖“世仕州郡”，孫堅也是“家世仕吳”<sup>①</sup>，在本郡至少不

<sup>①</sup> 《三國志》卷三二《先主傳》，卷四六《孫堅傳》。

是單家。地方各級長官有任期，而地方僚佐多世襲，我們認為東漢時期的地方政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當地大姓、冠族控制的。

大姓、冠族又累世通過察舉和辟舉跨出地方，為朝廷登用。東漢察舉孝廉，史籍有明文紀載其由州郡吏得舉的凡四十人，茂才六人。這個數字並不大，但不少孝廉、茂才出身無徵，舉自州郡吏的肯定超過此數。州郡大吏一般既由大姓、冠族充當，舉自州郡吏的孝廉、茂才自然也是大姓、冠族。其實，非舉自郡吏的多半也是大姓、冠族，因為主管選舉的功曹也即是這一階層的代表人物。

更重要的是東漢選舉和鄉里清議有緊密的關係，而主持鄉里清議的則是所謂“名士”。名士是習見於東漢的一種稱號。《後漢書》卷八二上《方術傳》論中范曄曾對東漢名士作了概括性的評論，他說這些名士都“刻情脩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所謂“刻情脩容”，是指言行帶有矯揉造作的味道，這一點在《後漢書》和應劭的《風俗通義》中都有記載；所謂“依倚道藝”，是指依託經術；這兩句也就是東漢博取功名必要的條件即所謂“經明行脩”。最後一句“以就聲價”是說憑藉上述二條以博取名譽，高抬身價。范曄的評論固然不能包括所有名士，因為也有一些名士並非這樣虛偽，但卻真實地刻畫了一時風氣。當時，一些人由於某種道德方面的表現超人一等，因而出了名，被認為名士，那就察舉秀、孝有他，公府州郡辟舉也有他；進而朝廷下詔特徵，平步青雲；退而操縱選舉，隱操政局。東漢後期，名士的活動對於當時政治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對於選舉幾乎起決定性的作用。《後漢書》卷六八《符融傳》：

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問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

這兩個高卧京都，暗通聲氣的大名士曾經隱操三公辟舉之權。漢末品評人物的專家並推郭泰、許劭。《後漢書》卷六八《許劭傳》說“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又說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人倫臧否本是當時名士專業之一，名士清談的主要內容就是臧否人物，像汝南那樣有組織的每月升降品題雖然不見他郡，但諸郡通常由名士主持鄉里清議，品題人物是無疑的。

名士固然不一定從大姓、冠族中產生，但出於大姓、冠族的恐怕要佔頗大的比例。上述兩位人物品題權威，郭泰出身低微，汝南許氏卻是累世三公。被黨錮之禍的名士們家世可考的也以大姓、冠族爲多，三君中竇武是貴戚，陳蕃祖是河東太守，劉淑祖是司隸校尉。八俊以下，李膺祖是太尉，父趙國相；荀翌叔父荀淑是有三公之望的大名士，這一家有好幾個太守；杜密雖不記先世官爵，杜氏卻是潁川名門，前有杜根，三國時有杜襲，應是冠族；王暢父是太尉；劉祐是宗室，“代有名位”；魏朗出身縣吏，門戶不高，但會稽魏氏乃四姓之一；趙典祖是太尉<sup>①</sup>；尹勳伯父是司徒，兄爲太尉；羊涉“家世冠族”，泰山羊氏七世二千石、鄉、校；張儉、岑暉父並是太守；陳翔祖父是司隸校尉；孔昱一族自西漢後期以來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黨錮傳》中人物不記先世官爵的固然不乏其人，明言出自卑微或單家的卻沒有，而且幾乎都以察舉孝廉起家，應當亦以出自大姓冠族爲多。當時大名士陳寔“出於單微，少作縣吏，常

<sup>①</sup> 《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傳》序說趙典“名見而已”，據《華陽國志》卷一〇“蜀郡士女”有趙典，云：“字仲經，成都人也。太尉戒孫也，與潁川李膺等並號八俊。”又有趙謙、趙溫，并趙戒孫。謙歷位卿尹，初平元年爲太尉；溫初平四年拜司空、司徒。二人官三公並在初平，在黨錮事後，趙典或已不及見。

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佐”<sup>①</sup>；郭泰“家世貧賤，母欲使給事縣廷”<sup>②</sup>，像這類出自貧賤，因受名人賞識提拔因而成名者也不乏其人，那時還不像門閥制度形成後那樣“士庶之間，實自天隔”，但畢竟是少數，而且通過名士這條道路，即將成爲大姓、冠族，陳、郭二家便是這樣。

名士通過功曹職位和主持鄉里清議來操縱選舉，實質上也就是當地大姓、冠族操縱選舉。東漢後期政論家崔寔、王符、仲長統在他們的著作中議論選舉之弊主要有兩項：一是重視家世族姓；二是朋黨交結<sup>③</sup>，二者的結合也就是大姓和名士的結合。

由於政治地位和文化修養的優越性，大姓、冠族中能够產生名士；同時，由於宗族、鄉里組織所起的作用和在當地的政治、經濟力量，大姓、冠族的代表人物又有能力組織武裝隊伍。名士和武裝隊伍的豪帥有時相兼，如資助曹操起兵的陳留孝廉衛茲，他能散家財組織武裝，爲太守張邈將，卻又是受到郭泰贊揚的名士<sup>④</sup>。又如鮑信，父丹官至少府，“世以儒雅顯”，顯然是泰山冠族。他自己是何進當國後舉用的名士之一，何進命他以騎都尉名義還泰山募兵。當他率領募兵到洛陽時，何進已死，又還泰山，再次募集了步兵二萬，騎七百，參加關東討董卓軍<sup>⑤</sup>。還有個王匡，也是泰山人，情況亦與鮑信相同<sup>⑥</sup>。鮑信、王匡是大姓、名士，同時又能在本鄉募集武裝隊伍；也有出自同族，而名士與豪帥卻各有其人。《三國志》卷一一《王修傳》：

① 《後漢書》卷六二《陳寔傳》。

② 《後漢書》卷六八《郭太傳》。

③ 見王符《潜夫論·讀學篇》、《實貢篇》，《全後漢文》所輯崔寔《政論》及仲長統《昌言》。

④ 《三國志》卷二二《衛臻傳》注引《先賢行狀》稱他“爲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又引《郭林宗傳》曾經稱贊他“少欲”，當然亦一時名士。

⑤ 《三國志》卷一二《鮑助傳》注引《魏書》。

⑥ 《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英雄記》。